

JIE FANG JUN WEN YI CHU BAN 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我爱祖国的蓝天

羊鸣歌曲选



我爱祖国的蓝天

——羊鸣歌曲选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一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祖国的蓝天：羊鸣歌曲选/羊鸣编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1

ISBN 7-5033-0925-3

I. 我… II. 羊… III. 创作歌曲-中国-选集 IV. J64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市兴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插页：4

字数：380千字 印数：1—3,400

定价：25.50元(贻)



羊 鸣近照

A Gift From

贈



1964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歌剧《江姐》后与演出人员合影(三排右一为羊鸣)

1954年在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时与作曲系同班同学合影(二排右四为羊鸣)



1949年在辽东军区宣传大队(左为羊鸣)



1941年与父亲杨德和、
母亲袁淑芹、弟弟杨培方



1994年在山东长岛老家旧址



1988 年赴内蒙古采风，收
集蒙古族民歌(左四为羊鸣)

1995 年随艺术家“万里采风”团赴
孔繁森故乡——聊城五里墩村采访



1996 年赴黑龙江采风，听鄂伦
春族大妈演唱民歌(中为羊鸣)

1987 年赴新疆采风，在哈萨
克族人家中作客(中为羊鸣)





1990 年参观空降兵部队跳伞时与战士们合影(后排右五为羊鸣)



1995 年摄于空军某机场



1995 年在空军某基层连队
与战士交谈(中为羊鸣)

1990 年在空降兵黄继光连与战士们座谈(左二为羊鸣)





1996 年全军艺术系列音乐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左二为羊鸣)



1994 年总政文化部部长刘晓江与全军歌曲创作研讨会代表合影(前排右四为羊鸣)



1999年空军首长在《中国空军进行曲》首
仪式上向曲作者之一羊鸣颁发奖状



1995年采访路上试唱
新作(前排中为羊鸣)

1994年歌曲创作笔会
讨论新作(中为羊鸣)



1996年空政歌舞团歌曲创作笔会词
曲作者及领导合影(前排右三为羊鸣)



1992 年祖孙弹琴



1996 年与家人“卡拉 OK 大家唱”



1961 年与夫人王颖智

1991 年羊鸣夫妇与孙女、外孙



追求自己的理想 忠诚脚下的土地

(代序)

走过人生的六旬旅程之后，羊鸣留下了9部大型歌剧、6部小歌剧和数百首歌曲，尽管9和6都是吉祥的数字，但又有多少人知道，那每个音符，每段旋律，每件作品，都是他满腔心血的喷洒！

羊鸣生于1934年7月31日。山东长岛县人。原名杨培兰。7岁那年，这个大海的儿子因家境贫寒跟随父亲“闯关东”定居于辽宁宽甸县。童年时在日寇统治下的伪满，断断续续念了5年书。1947年春，他的第二故乡——宽甸县解放了。乌云驱散，解放区呈现出一片明朗的天，学校的气氛顿时也活跃了起来。土改运动中他是儿童团长；演戏、跳舞、唱歌，他是积极分子。1947年冬天，这个13岁的少年改名为杨明，谎报已经15岁，高唱着《八路军进行曲》，高呼着“保家保田，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一名部队文艺战士。

起先羊鸣在安东（现丹东）军区文工团跳秧歌舞，扮演歌剧里的小角色，还干过一段舞台装置工作。后来学会了打击乐、吹长笛、拉提琴，加入了乐队。他能实现作曲的梦，还得感谢他那提琴拉得好、又擅长作曲的乐队队长——一位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的“老革命”张西风。羊鸣弄不懂：为什么七个音符在队长笔下七

颠八倒，就成了朗朗上口的调调儿？出于一种好奇心他向队长求教作曲，由于害怕别人取笑，他要求队长保守“秘密”。于是他们就按着制订好的“地下教学”方案开始了启蒙学习：羊鸣把音乐习作偷偷放在队长褥子底下，队长在晚上熄灯前抽空给予修改，并在原稿上注明为什么要这样改，还有什么要求等等。第二天羊鸣在原地偷偷取回修改稿，仔细地理解、斟酌、思考，像小苗吮吸着甘露那样反反复复地领会，一步步地提高。赶上节假日，队长还要集中时间传授技艺，总结经验。纸里包不住火，“地下”活动很快被人察觉。一时“小杨明作曲啰！”的说法一哄而起，一度成了团里一些人的笑谈。记得有一次他大着胆子将自认为写得不错的曲子拿给音乐教员兼指挥看，教员默读了几遍之后，用左手捂着鼻子，发出“咩咩”的声音，打趣地说：“小杨明啊小杨明，这曲子可真成羊鸣了。”由此可见这首曲子幼稚到了何等程度。但羊鸣并不气馁，为了鞭策自己早日从“咩咩”的稚声稚气中走向成熟，他索性从此将笔名定为“羊鸣”。

别人的讥笑和他的稚气并未使队长灰心，始终如一地帮助着他。队长常说：要成为人民的音乐家，首先要了解人民，学习人民的艺术。这些耐人寻味的话，深深地铭记在这位学生的心中。当时是战争年代，演出活动主要在农村和小城镇，于是每到一地队长就领着他到民间歌手、艺人、甚至庙里的和尚、道士那里收集民歌、乐曲。有时就连市镇上的叫卖声也不放过，如实地记录下来。音乐的天地是这样广阔，音乐就充溢在我们的人民中间。发现了这一点，当时他是多么兴奋啊！

1949年底建国后的第一个新年快要到了。寒冷的冬天，室外飘着鹅毛大雪，安东镇江山下的一座小楼里，炉火正熊熊地燃烧着。四处锣鼓喧天，人们在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看到眼前这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想到3年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祖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作为一个从旧社会的苦

难中走来，又经受过战争洗礼的文艺小兵，此时此刻羊鸣的心情是那么激动！冒出了“写一首歌曲表达一下”的愿望。霎时，一股创作激情油然而生：“艰苦奋斗几十年，终于今日见晴天。”“五千年未第一次，开天辟地头一年”这样一些词句脱口而出。他立刻动起笔来，进入了沉思……此刻，排练场里又响起了唢呐声。多么熟悉的一首唢呐曲牌呀，这不就是跟着“老革命”队长从民间吹鼓手那里记录下来的秧歌舞曲吗？每当逢年过节，文工团就吹着这首曲牌，跳着大秧歌去街上庆祝，到军营联欢，进政府机关慰问。于是，他就以这首曲牌作为引启句，很快就从词到曲写完了这首《庆新年》，并首次在原稿的右上角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词曲作者羊鸣”。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他把这首歌寄给了东北军区《部队文艺》编辑部。居然在同年12月的那期上发表了，还寄来了稿费。他简直不知该如何和战友们分享这小小的成功带来的喜悦！对一个醉心于作曲的初学者，这是多么大的鼓励呀！这首幼稚、浅薄、近似“牙牙”学语的处女作，是经过一番刻苦摸索后留下的第一个脚印，也是走向音乐创作高峰的起点，也为以后的创作播下了力量、信心和希望的种子。从此羊鸣的创作便从“秘密”转向公开，在大家的鼓励下，业余承担了一些团里的创作任务。

在羊鸣的音乐道路上，往往是欢乐未尽、苦恼即来。1950年他从陆军转到了空军，调到东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从事作曲专业。新的环境，新的工作，要求他在音乐创作上要有新的提高。原来的水平远远不能适应新工作的需要了，必须向音乐的深度、广度进军。但苦恼的是，一个基层单位很少有使自己提高的条件。加之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战斗的生活非常紧张。他深感到起步容易，提高难呀！如何解决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在提高专业技能方面有没有捷径可走？羊鸣写了封信求教于他所崇敬的作曲家、当时正在戏剧学院从事歌剧音乐教学的马可同志。马可是这样回答的：“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熟悉工农兵和学习专业理论技巧，

是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不可缺少的两个基本功。如果条件允许，最好两者兼顾。如不允许，你就先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吧！在斗争中挤时间学习提高。”并说：“在学习专业知识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捷径和窍门可走，只有两个字——刻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点播心灵的话语，对羊鸣又是一次启蒙。从此他便更加自觉地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

在多次去朝鲜战场慰问、采访的过程中，一部反映中朝人民战斗友谊、由羊鸣作曲的第一部大型歌剧《一个志愿》（编剧：于莘林）产生了，并且由他指挥演出。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他还写了一些声乐作品，自修和声学等音乐理论，开始欣赏与分析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外国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这些学习虽然是肤浅的、有限的，但为他日后考入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沈阳音乐学院前身）做了准备。

当羊鸣1953年跨入这所渴慕已久的音乐学府时，仿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音乐世界。他在尊敬的校长李劫夫和霍存慧、邱仲广、杨绍谦等教授和讲师的指教下，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活。他在作曲系从视唱练耳到和声、复调、配器、曲式及古典诗词、民族民间音乐等一系列重要的作曲基本理论知识，来了一个全方位地补习和提高，为以后的写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时他深深地体味到：“楼高必须地基深”的道理，要想成为一名有作为的作曲家，光有一腔热情是不够的。从此他便投入了音乐的大海洋——教室里听课；宿舍中作题；资料室里欣赏名著，翻阅谱例；钢琴室里练琴。由于学习努力，成绩优良，他被评为全校优秀生，1956年毕业后重返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这时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毕业了，不能是学习的完结，而是学习的继续；二是学习了专业技巧，不能因此而捆住自己的手脚，相反，应该更富于创造性，因为没有创造就谈不上创作。至今他仍恪守着这两条原则，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1958年羊鸣调到空政文工团从事歌剧音乐创作。到了北京，编入了大团，眼界拓宽了，目标更高了。从此，他的作曲生涯便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并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就在羊鸣调到北京的第二年，他与姜春阳等合作写出了第二部大型歌剧《牡丹江畔》（编剧：肖驰、阎肃等），并由他指挥参加了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小歌剧《刘四姐》（编剧：阎肃）1960年上演后，反响很大，许多兄弟剧团学排上演，并由山东出版了单行本。此外还写出了被国人传唱的《我爱祖国的蓝天》（阎肃词）、《山歌向着青天唱》（四川民谣）以及与姜春阳合作的《焦裕禄啊，我们的好书记》（剑兵词）、舞蹈《家家乐》（编舞：韩笑黎）等许多音乐作品。

奇迹总是疏远弱者，对于一个强者往往不容其力。羊鸣28岁那年干了一件大事：他和姜春阳、金沙接受了为歌剧《江姐》谱曲的任务。此时的羊鸣，可不是十多年前“咩咩”的羊鸣了，他在不断地创作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为完成《江姐》的创作任务，他们从1962年春天开始，一下江南，两入蜀道，收集了川剧、婺剧、越剧、沪剧、四川扬琴、四川清音、杭州滩簧等许多音乐素材，走访了江姐生前的战友。阎肃的剧本出未后，羊鸣进入了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创作阶段，寡言少语、暴躁，讨论剧本时莫名其妙地争吵。《江姐》历时两年，剧本四次更改，仅《红梅赞》一曲就八易其稿，修改达20余次。

《江姐》整个的创作过程，得到了当时空军领导的支持与帮助，特别要提的是罗瑞卿总长和刘亚楼司令员，他们的关怀是令人感动的：刘亚楼同志曾在苏联看过大量西洋歌剧，他非常注重音乐主题的集中、典型和在全剧的发展与贯串；罗瑞卿同志也多次提到写好主题歌，并使它能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的重要性。为此，写好主题歌，并赋予江姐最美的音乐形象的重担，就压在羊鸣他们的肩上了。

为写好这首主题歌，编剧与作曲夜以继日地苦思再苦思，追

求再追求，否定再否定，真有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味道。记得歌词原为“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急浪险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唱后大家都不满意，大家各自埋头憋呀，终于受毛主席诗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启发，思路顿开，阎肃一挥而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羊鸣笑了！他望着立意鲜活的词，动情的旋律展开了翅膀。他在谱写《红梅赞》时，很自然地想起了成都听过的四川清音，在杭州听过的丝弦弹唱。那婉转动听的旋律，那弹拨的节奏中透出的阳刚之美，羊鸣不能不惊喜地认定，这就是江姐音乐的种子。这颗种子深埋心底，一曲形象鲜明、优美动听的《红梅赞》就奔泻而出。

1964年9月《江姐》一上演就轰动全国。人们高度评价《江姐》音乐“在歌剧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取得了可喜成就”。特别是1964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京观看了《江姐》以后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嘛！”从此一曲《红梅赞》唱遍大江南北，30年来陶冶了两代人。

《江姐》剧本1965年由戏剧出版社第一次出版，1978年、1992年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两次再版。《江姐选曲》1965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1978年再版并出版了带钢琴伴奏谱的选段。1978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歌剧艺术片。近几年又出版发行了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等。

《江姐》成功了，羊鸣倒下了。他患了严重的神经紊乱，不能听任何音响，不能安眠，经常泪水如雨。此后整整10年间，羊鸣常要靠服用速可眠、奋乃静等药片维持生活与工作。

谁都知道歌剧是音乐殿堂里的明珠，可羊鸣从三十多年前想学作曲开始，也不知自己怎么就误入歌剧的“歧途”，而且身不由己。